

新發展格局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研究*

毛艷華 陳朋親

[提 要] 回歸以來,澳門中葡平台的建構和發展經歷探索、定型和深化三個階段,內涵不斷豐富、功能不斷強化。當前,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交織疊加,深入分析新形勢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基礎條件與面臨挑戰,對於“一國兩制”下發揮澳門優勢,激發平台活力,做實做強平台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新時代新征程澳門應主動作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準確把握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新內涵;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完善和夯實澳門中葡平台功能;完善現代商業服務體系,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專業化服務水平;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國際影響力。通過促進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更好服務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

[關鍵詞] 新發展格局 中葡論壇 澳門中葡平台 葡語國家

[中圖分類號] F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038 - 13

1999 年澳門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中央高度重視回歸後的澳門經濟發展和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功能角色,2003 年 10 月首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以下簡稱“中葡論壇”)在澳門創立後,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下簡稱“澳門中葡平台”)的功能角色逐漸得到確立。中葡論壇開啟了以語言文化為載體的經貿合作新模式,也開啟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新征程^①。中央將“中葡論壇”永久會址和秘書處設於澳門,這是堅持“中央大力支持,澳門主動作為”的重要舉措,也是堅持“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充分體現,彰顯了“一國兩制”的巨大包容性和創造力。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澳門特區政府與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以中葡論壇為依託,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有序推進,平台內涵不斷豐富、平台作用不斷強化。澳門中葡平台建設不僅直接促進了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而且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支點。本文梳理了回歸以來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歷程與階段成效,分析了新形勢下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基礎條件與面臨挑戰,並就新發展格局下推動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提出對策建議。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機制體系研究”(項目號:18ZDA041)、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資助項目“新形勢下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路徑與體制機制創新研究”(項目號:SML2020SP002)的階段性成果。

一、回歸以來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歷程與階段成效

澳門中葡平台是中央賦予澳門特區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定位,也是澳門發揮自身優勢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的必然選擇。以中葡論壇為重要依託,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澳門中葡平台建設和發展,連續多次舉辦中葡部長級會議,並納入國家發展規劃以明確定位,出台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等。同時,澳門特區政府也不斷深化自身角色,強化“中葡平台”功能。總體上看,回歸以來澳門中葡平台建設經歷了三個階段,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一)探索階段:實施“遠交近融”策略,彰顯商貿平台特色

澳門回歸之前的很長時期,當時的澳葡政府實行“無為而治,高度不干預”政策,導致澳門經濟“隨波逐流”,嚴重依賴博彩業,作為現代服務業重要基礎的經貿服務等發展滯後。因此,回歸後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澳門如何依託祖國內地和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在國際經濟關係深刻變化中尋求發展機會,這是擺在澳門特區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2001年10月,時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峰會上首次提出將澳門構建為“海內外中小企業的經貿合作平台”;2002年11月,何厚鏵在《200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又提出“遠交近融”的對外關係基本策略,努力構建各種合作平台。以此為基點,何厚鏵多次遠訪葡萄牙、法國、歐盟、非洲葡語國家等,近訪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內地省市,向世界和內地闡述澳門構建經濟、文化和商業交流平台的設想^②。澳門特區政府還將“遠交近融”的策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把內地加入WTO、實行“自由行”政策和簽署CEPA、建設珠澳跨境工業園、開展“泛珠”區域合作等政策作為澳門合作平台發揮作用的機遇。因此,澳門利用“一國兩制”賦予的發展空間,發揮“自由港”、“單獨關稅區”和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紐帶、橋樑”等傳統、特色與優勢功能,全面鋪開建設“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後拓展至泛珠三角區域)、“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等三大服務平台。

2003年10月,“中葡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在澳門舉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出席了論壇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推進新的合作,譜寫新的篇章”的重要講話,並指出“在澳門首次舉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對於澳門進一步發揮聯繫祖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的橋樑與紐帶作用,具有特殊意義”^③,會議還通過了中葡論壇第一份《經貿合作行動綱領》。2006年9月和2010年11月在澳門又分別舉辦了第二屆、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會議分別通過了《經貿合作綱領(2007—2009)》、《經貿合作綱領(2010—2013)》。舉辦“中葡論壇”對澳門進一步發揮聯繫祖國內地和葡語國家的橋樑紐帶功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隨著“中葡論壇”的持續召開,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也呈現上升的發展態勢。2003年中國—葡語國家貿易總額僅為110億美元,至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時,中葡貿易額高達914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大大高於中國同期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合作也由最初的政府間合作、貿易、投資與企業間合作、農業與漁業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自然資源合作等領域,逐步擴大到金融、旅遊、物流、衛生、科技、廣播電視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論壇各方也多次“重申和希望澳門繼續積極發揮其平台作用,以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關係”。總體上看,回歸祖國後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行“遠交近融”策略,充分發揮澳門比較優勢,抓住舉辦“中葡論壇”的機遇,努力構建各種合作平台,商貿平台特色受到廣泛認同,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商貿服務平台作用初步顯現。

(二)定型階段:聚焦“中葡平台”建設,對接國家發展規劃

自“十二五”規劃開始,國家將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納入發展規劃,並對澳門在新時代國家

發展中的功能角色進行了定位,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簡稱“一中心、一平台”)。“十三五”規劃又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可持續發展”、“支持港澳參與國家雙向開放,鼓勵內地與港澳企業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多種方式走出去”^④。2017年12月18日國家商務部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的《CEPA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設立了“深化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工作”專章;2018年12月6日國家發改委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關於支持澳門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提出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金融服務平台,推動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等。由此表明,中央政府從國家戰略、區域合作等多方面積極支持澳門中葡平台建設,將澳門中葡平台建設納入國家整體規劃並重點扶持,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中葡論壇”可持續建設成為“一國兩制”澳門成功實踐的典範,也是澳門進一步強化其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橋樑和紐帶功能,以及“精準聯繫人”區位優勢和特殊地位的新著力點,也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助推力^⑤。

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政府也改變以前較為寬泛和籠統的“三大平台”建設構想,逐步轉向和聚焦於中央賦予澳門的“一中心、一平台”發展定位。2012年澳門特區政府首次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2016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專門成立了以行政長官為主席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委員會,並在澳門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加快“一個平台”建設,以便與國家發展規劃相銜接。同時,澳門特區政府在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框架下,積極推進“中葡雙語人才、企業合作與交流互動的信息共享平台”、“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逐步構建了“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主體功能服務體系,陸續創辦了中葡發展基金、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等輔助性機構。同時,還建設了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青年創新創業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舉辦了葡語國家產品展、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經貿合作洽談會、葡語國家藝術文化週、文化藝術節等活動,澳門特區內部已形成了“一中心、一平台”建設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並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不斷推進和落實,“中葡平台”的功能定位也在澳門基本成型和聚焦^⑥。

(三) 深化階段:縱深推進“中葡平台”建設,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堅持“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原則,澳門新一屆特區政府更是將“中葡平台”作為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抓手。2020年澳門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及“葡”字206次,提及“平台”132次^⑦。行政長官賀一誠在澳門回歸20週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相似,經貿關係密切。未來澳門會發揮這些優勢,增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流合作”^⑧。特區政府在澳門“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深化“中葡平台”建設,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提供廣闊空間。例如,澳門金融管理局積極向葡語國家推薦澳門特色金融政策,與葡萄牙保險與退休金監管局簽訂了新的《合作及技術援助協議》;澳門一家中資銀行還和葡萄牙兩家銀行分別簽署了《人民幣業務清算協議》和《人民幣業務協議》,積極通過澳門平台辦理中國與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業務,提供人民幣金融服務支持,助力澳門建設“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⑨。

中央政府也大力支持澳門特區不斷深化“中葡平台”建設,積極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

平台,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設立中國與葡語國家雙語人才培養基地,推動澳門建設葡語國家傳統醫藥產業國際註冊、認證、交易中心等^⑩。國家“十三五”期間,內地與澳門完成了 CEPA 的優化升級,成立了內地與澳門經貿合作委員會,擴大了雙方合作範圍,豐富了合作內容,特別針對兩地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中葡平台”建設等方面設立了 5 個工作委員會,負責務實推進兩地經貿及各個領域的具體合作事項,並統籌解決兩地經貿合作領域的重大議題。2019 年 2 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綱要》)提出,繼續深化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戰略定位,同時還賦予澳門“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即“一基地”)新定位。2021 年 9 月發布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建設方案》(簡稱《橫琴方案》)提出,要充分發揮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口作用,支持合作區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另外,2022 年 4 月 10 日在澳門召開的中葡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特別會議,簽署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會議特別聲明》,中國與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心也在澳門揭牌,以共同抗擊疫情,恢復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澳門回歸以來,在國家層面統籌規劃、國家領導人重視以及廣東等內地省份的積極支持下,澳門中葡平台建設歷經探索、定型和深化三個階段,“中葡平台”的內涵不斷豐富完善。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過程中,發揮澳門獨特優勢和橋樑紐帶角色,積極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在教育、文化、旅遊、經貿等多個領域的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在教育方面,積極發揮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內地葡語教育的引領作用,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教育聯盟”、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出台赴葡語國家攻讀學位助學金專修計劃、“一帶一路”助學金計劃。還推出“中國葡語國家青年交流計劃”,並與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孵化機構聯動,吸引近 200 名葡語國家青年走進大灣區,深化了中葡青年交流合作;在文化方面,澳門特區政府持續舉辦十四屆“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中葡文化藝術節”、葡語國家文化論壇等,展示中國及葡語國家和地區的手工、美食、作品、話劇、歌舞以及藝術團體表演,加深公眾進一步認識中國內地、澳門與葡語國家獨特的文化藝術、風土人情;在旅遊方面,澳門旅遊局 2010 年分別與佛得角、幾內亞比紹和莫桑比克簽署旅遊合作諒解備忘錄,2013 年及 2015 年分別與東帝汶和安哥拉簽署相關備忘錄。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於 2016 年與葡萄牙經濟部簽訂旅遊領域合作協議。持續在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設置葡語國家館及舉辦“葡語國家旅遊產品推介會”,過往也邀請葡萄牙及巴西作為“世界旅遊經濟論壇·澳門”的合作國家,持續為葡語國家培訓旅遊人才近 150 人。

在經貿方面,“中葡平台”建設促進了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貿易不斷擴大。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論壇年報》的數據,2002 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僅為 56 億美元,2012 年突破 1,000 億美元大關,2018 年達 1,473.54 億美元,總體呈現上升趨勢。2020 年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和葡語國家守望相助、共克時艱,利用中葡論壇協調聯繫機制,共同抗擊疫情,各方貿易投資合作持續深入。2022 年 1~11 月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總額達 1,989.37 億美元,同比增長 6.75%^⑪。澳門特區政府以“平台”的方式攜手大灣區城市共建“葡語國家產業園”,創新國際經貿合作模式。此外,特區政府正積極推動大健康產業的發展,將中醫藥作為中葡人文交流的重要內容,透過舉辦中醫特色療法培訓班、傳統醫藥應對疫情網絡研修班,致力把中醫藥推廣至葡語國家及周邊其他國家。總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葡平台”的內涵不斷豐富,功能不斷完善,已基本形成了以經貿合作服務為核心,科研、中醫藥、文旅會展商貿、金融及青年創業等領域協同發展、共同推進的綜合服務平台。澳門中葡平台已成為澳門特區最顯著的優勢和最具特色的城市品牌^⑫。

二、新形勢下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基礎條件與面臨挑戰

進入新時代國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國兩制”下澳門能夠更好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加快建設和升級澳門中葡平台。同時,新冠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局部衝突和動盪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實現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也面臨不少挑戰。

(一)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基礎條件

澳門憑藉於中國內地及葡語國家的緊密聯繫、國際化的商業服務、獨特的制度優勢,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精準聯繫人”、世界華商交流對話的窗口,這是澳門進一步優化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現實基礎。葡語國家市場的崛起、豐富的資源稟賦及現實的發展需求,也為澳門平台升級注入了動能。

1.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背靠祖國的堅強後盾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為澳門中葡平台升級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自行制定航運政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回歸以來,澳門積極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不斷把“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轉化為實際的治理效能,先後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的侵襲。澳門保持繁榮穩定,並成為全球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因此,“一國兩制”下高度的國際化、自由港稅制、自由市場制度和多元文化匯萃等因素仍然是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重要基礎條件,有利於澳門加快實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背靠祖國優勢是澳門中葡平台全面升級的堅強後盾。新時代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澳門中葡經貿服務平台升級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聯繫的窗口和橋樑,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全面服務內地企業拓展葡語國家、歐盟及南美市場過程中,澳門的特色金融、商事服務、科技創新、專業服務等優勢領域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這將大大增強和提升澳門中葡平台的功能地位。同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也為澳門中葡經貿合作平台升級發展帶來重大機遇。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與葡語國家的商貿與投資合作橋樑,大灣區建設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不僅能夠拓寬澳門的發展空間;而且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建設中葡國際貿易中心和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也將進一步豐富澳門中葡經貿服務平台的內涵與功能。可見,依託背靠祖國優勢,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有利於抓住國家重大戰略發展機遇,發揮國家對外開放中“精準聯繫人”的功能角色,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澳門自身更好地發展。

2. 澳門的策略性地位與葡語國家市場的崛起

近些年,憑藉國家重點實驗室落戶澳門、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以及豐盈的財政實力,澳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引擎城市之一和科技創新走廊重要節點,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高水平國際人才高地等建設中具有策略性地位。尤其是超大規模集成電

路、中藥質量研究、智慧城市物聯網、月球與行星科學等國家重點實驗室先後批准建立，成為澳門特區服務大灣區科技創新高地的名片。澳門可以充分發揮以上優勢，拓展澳門中葡平台的國際科創合作功能，與內地先進製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型研發機構等深化產學研合作，推動科技成果加快轉化，打造粵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助力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整個國家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另外，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可自行處理地區性的經濟、文化對外事務，可以以“中國澳門”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互設機構、簽訂有關雙邊協議、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公約、簽發護照和旅行證照等。澳門這種特殊地位，可以搭建城市外交事業的平台，在對外關係中服務和促進國家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推動國家形象的傳播。同時，2020年以來受新冠疫情影響，雖然澳門經濟大幅下滑，但截至2021年底特區政府財政儲備的資本金額仍達到6,431.7億澳門元，國際信貸評級維持“穩定”。回歸以來澳門外匯儲備持續穩定增長，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8月底，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儲備資產總額達2,129億澳門元（約263.4億美元）。因此，澳門上述策略性地位和優勢資源，既可以助力國家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形成商品和要素充分流動的現代化市場體系，也可進一步強化澳門作為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地位。

澳門中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地位的提升，也與葡語國家市場崛起這一機遇息息相關。一方面，葡語國家共同體擁有2.84億人口，是世界上第十大經濟體^③，財富總值高於韓國，低於加拿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年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經濟將保持9.1%的增速。因此，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投資合作具有巨大的潛力。另一方面，除巴西、葡萄牙外，其他葡語國家屬於“後發國家”，減貧工作、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等任重道遠，在資源開發、消費品貿易、農業技術、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機遇。根據《“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指數報告2020》，葡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市場潛力大，但因資金短缺，面臨遏制增長的瓶頸，2020年得分低於2019年。葡語國家共同體近幾次舉辦的首腦峰會，強調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採用如PPP等形式的融資結構，有效管理風險。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出訪葡萄牙時還簽署了有關“藍色經濟”和“藍色夥伴關係”的系列雙邊合作文件，拓展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海洋合作。因此，中國與葡語國家深化各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合作為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提供了新動力。

3. 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內在動力與葡語國家發展戰略實施的外在需求

澳門是典型的“微型經濟體”，經濟結構主要以博彩旅遊業為主，產業結構單一，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澳門的出入境人次大幅下降，地區GDP收縮近六成。加之新加坡、韓國等周邊經濟體逐漸開放更多的博彩市場，澳門博彩的傳統優勢有所下降，產業轉型和經濟適度多元化迫在眉睫。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賀一誠時指出：“經過這次疫情，澳門社會各界對澳門經濟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認識更加清晰，對澳門發展的路向思考更加深刻”^④。為了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澳門需要促進現代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大力發展科創和先進製造、大健康產業，做強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等，形成“澳門平台+國際資源+橫琴空間+成果共享”的區域產業聯動發展新模式，延展產業鏈條，推動產業鏈轉型升級。未來澳門將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泛會展業、現代金融業，支持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平台、中葡國際貿易中心、數字貿易樞紐港，鞏固提升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口作用，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國際企業“引進來”提供樞紐平台。因此，澳門內部對加快新產業發展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和民生持續改善的訴求，也是澳門

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重要推動力量。

在新興經濟體加快融入全球產業分工的背景下，葡語國家相繼推出涵蓋基礎設施、產業體系建設的國家發展戰略。例如，“東帝汶 2011—2030 國家發展戰略”不僅包括基礎設施領域投資超過 100 億美元，還涵蓋農業合作、海洋漁業、能源礦產、旅遊酒店、商業貿易、交通運輸等規劃領域^⑤；“安哥拉 PDIA—2025 戰略”提出製造業要達到 GDP 的 9%；“巴西工業互聯網行動計劃”的重點是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加快先進製造業和互聯網結合，推動產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莫桑比克工業化計劃”（PRONAIMO）則提出建立當地工業價值鏈，以競爭性出口替代進口，促進基礎設施投資來支持經濟快速增長，以及推進生產能力專業化和現代化。葡語國家共同體布局工業化計劃，有助於拓寬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範圍和提升合作層次，有助於強化澳門在國際分工中的節點功能，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促進澳門經濟結構轉型，鞏固和提升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地位。另外，葡語國家共同體於 2021 年 7 月 22 日簽署了《自由流通協議》，旨在促進區域內、成員國間的商品、服務、人員等要素的順暢流動，這為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升級帶來利好。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有利於發揮澳門背靠祖國聯通 RCEP 大市場和連接葡語國家新興市場的優勢地位，在服務國家加快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中可以更大地提升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

（二）澳門中葡平台升級面臨的挑戰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疫情與多種全球性危機交積疊加，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面臨重塑，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以及中葡論壇的功能將不斷發生變化和調整，呈現新的形態和特徵^⑥。因此，後疫情時代，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發展既面臨外部環境的挑戰，也面臨內部經濟結構深層次問題的影響。

1. 新冠疫情影響持續與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

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一些國家限制或禁止群體活動，減少人群聚集風險，實行邊境控制，採取嚴格的旅行限制等措施，全球供應鏈阻斷，航空旅遊相關的服務行業遭受嚴重打擊，世界經濟實現完全復甦的進程受阻。世界銀行於 2022 年 6 月 7 日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警告稱，全球經濟在新冠疫情後重創未癒，俄烏衝突又雪上加霜，加劇全球經濟放緩，世界經濟或正邁入長期增長乏力和通脹高企的時代。全球“滯脹”風險升高，恐重創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經濟體。新冠疫情還改變了貿易形態，數字技術成為全球供應鏈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傳統的貨物貿易不再是跨國貿易的重心，世界服務貿易增速快於商品貿易，研發、金融、專業服務等生產性服務貿易獲得快速發展，同時對跨境電子商務、數字化創新提出新要求。受新冠疫情、數字化轉型和多種全球性危機交織疊加的影響，全球產業鏈區域化、本土化、綠色化和數字化，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全球價值鏈形態重構和製造業向發達國家的回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澳門中葡平台的角色也難免會受到衝擊。

疫情爆發以來，澳門博彩旅遊業遭遇嚴重衝擊，引發的連鎖反應使澳門經濟承受巨大下行壓力。根據澳門經濟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與 2020 年相比，2021 年澳門經濟出現回暖，本地生產總值為 2,394 億澳門元，同比增長 18%。但 2022 年整體需求轉弱，第一季度 GDP 按年實質下跌 8.9%。服務出口按年下跌 4.7%，其中博彩服務出口下跌 25.1%。第二季度 GDP 按年下跌 39.3%，疫情下入境旅客人次按年下跌 27.5%。這表明疫情依然是影響澳門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疫情阻斷了生產要素和人員的跨境流動。葡語國家大多是發展中經濟體，疫情以來葡語國家關鍵經

濟領域也受到影響,特別是旅遊業、零售及其他服務業遭遇打擊,同樣面臨經濟衰退、市場萎縮等一系列問題。巴西經濟 2021 年實現了 4.6% 的實際復甦,但經濟規模依然比 2011 年的峰值減少了 1 萬多億美元,全年經濟增長呈現“弓背”狀態,第一季度增長 1.3%,第二季度增長 12.3%,第三季度增長 4.0%,第四季度增長 1.6%;葡萄牙 2022 年經濟逐步復甦、生產力恢復,但是由於移民工人國際流動受阻,出現“用工荒”,尤其是旅遊、餐飲以及建築等行業,勞動力短缺跡象明顯。其它亞非葡語國家,受糧食短缺以及債務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國家經濟“亮起黃燈”,增長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下行風險突出。面對後疫情時期全球化加速結構轉型,鞏固和提升澳門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地位是關乎“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澳門實踐的重大課題。

2. 葡語國家經濟脆弱性與營商環境相對滯後性

葡語國家共同體內部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各異,成員國家經濟存在較大差異。9 個成員國中,葡萄牙屬於歐盟國家,是經濟發達成員;巴西是金磚國家,屬於新興經濟體,其他都是發展中或者最不發達國家。巴西也是葡語國家中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九,也是拉美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安哥拉、佛得角屬於上升時期的中等收入國家。東帝汶、赤道幾內亞、聖多美與普林西比等發展相對落後,同時政局時常不穩定。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政治局勢、市場特徵等因素決定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限制性,澳門平台作用面臨諸多挑戰。另外,因為葡語國家大多數屬於資源型國家,依賴農業、礦業和採掘業初級產品的出口,這些國家的經濟更容易受到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如俄烏在糧食、食用油料、化肥等國際大宗商品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非洲葡語國家的進口小麥有三分之一來自俄烏兩國,兩國軍事衝突導致非洲葡語國家遭受供給短缺和價格上漲的風險衝擊,非洲葡語國家居民因此陷入貧困與飢餓的困境。同時,俄烏衝突再度加劇了全球供應鏈緊張,全球生產網絡更加紊亂,生產端價格壓力飆升並傳導至消費端,全球通脹面臨進一步上行壓力,這使得本就巨量債務負擔的非洲葡語國家更加陷入債務困境或面臨更高風險。這些複雜變化已導致非洲葡語國家國內治理水平和安全形勢的惡化,債務違約風險提高、“大國經略”非洲加劇,一定程度上衝擊中國與非洲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中國企業投資葡語國家面臨多重挑戰。

亞非某些葡語國家仍然存在政局動盪,局部戰爭與武裝衝突時有發生,部落和族民糾紛不斷,政府管理質量欠佳、貪腐嚴重、法治化程度低,這些不利因素加大了中資企業入駐投資風險。西方輿論大肆扭曲、抹黑中國,容易造成部分國家的誤解,影響中葡雙邊或多邊經貿關係。長期以來,亞非葡語國家營商環境排名極度落後,對入駐企業的投資經營帶來極大不便。《2020 年全球商業複雜性指數排名》,巴西排名全球第二大複雜性市場;《2020 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僅葡萄牙排名全球 34 位,其餘葡語國家在 100 名外;赤道幾內亞還是 2020 年清廉指數最後十名之內的國家。一些國家面臨著匯率波動風險,尤其是貨幣貶值,政府當局通常採用外匯管制措施,當地企業無法如約支付合同外匯款項,中資企業和個人投資者難以通過官方獲取美元,使其承受美元兌匯損失。另外,當前非洲葡語國家投資法、勞工法等法律體制還需完善,因勞動保護風險的企業合規問題時有發生,甚至罷工停擺,影響入駐企業的生產經營。由此可見,葡語國家整體營商環境滯後性,會影響企業和投資者的經營信心,進而影響澳門中葡平台的動力支持,不利於平台功能的發揮與持續升級。

3. 中國—葡語國家貿易結構單一化與澳門中葡平台面臨被“繞開”的壓力

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關係總體上是保持平穩的,但是中葡經貿發展的結構、數量和質量取決於國際環境、雙邊的政治局勢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等,如需求疲軟、增長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深度調整、科技創新等，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大多數葡語國家處於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初級階段，國內消費不足、通貨膨脹較高、基礎設施落後、產業結構單一，這給中葡經貿合作帶來不確定性。一方面，中葡貿易是製成品換初級產品的模式。即中國向葡語國家出口製成品，自葡語國家進口初級產品，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形成了“製成品和初級產品”為主的合作格局。例如，中國對葡萄牙更多出口的是家用電器、計算機及相關產品、化學製品、金屬及紡織品，自葡萄牙進口的主要是紙、軟木、礦物和礦石等原材料。另一方面，產業鏈的聯繫不緊密，缺乏產品內貿易的深度分工。如木材佔幾內亞比紹對華出口的 99%、佔莫桑比克對華出口的 70%，原油佔安哥拉對華出口的 99.5%，大豆、鐵礦石佔巴西對華出口的 80%，這些大多是初級產品貿易。^⑦中國與葡語國家這種貿易結構單一化的格局不僅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趨勢不相適應，而且長期維持這種低複雜度的貿易分工聯繫對澳門中葡平台的功能完善與質量升級帶來不利的影響。

回歸以來，澳門博彩旅遊業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在穩固了整個經濟體系中龍頭地位的同時，也推動了澳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入境旅客由 1999 年的 744 萬人次躍升至疫情爆發前 2019 年的 3,940 萬人次，達到歷史峰值；博彩毛收入由 1999 年的 130 億躍至 2019 年的 2,924.55 億（2018 年為 3,028.46，同比下降 3.4%，也是 2015 年以來首次下降）。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博彩毛收入同比下降 80%。隨著疫情趨向穩定，防控政策精準化，澳門入境旅客人次的回升，博彩旅遊活動有所恢復。總體上看，澳門回歸後博彩旅遊業的快速崛起，帶動了酒店、餐飲、零售、手信以及建筑工程等行業的發展，對外貿易也實現了復興，拉動了澳門整體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博彩旅遊屬於奢侈性消費，一旦受外部環境影響，將受到巨大衝擊。加上澳門大多數企業是國際品牌，為部分跨國企業在東亞地區的分支服務機構，經濟韌性水平低，在經濟危機中也表現出強烈的動盪，體現為一種依附式耦合的經濟韌性^⑧。澳門產業結構單一、過度依賴博彩業，加之博彩業的“擠出效應”，科創人才和新興產業難以在澳門找到賴以生存的產業鏈生態環境，這極大地限制了澳門中葡平台的功能培育與壯大，也制約了澳門與內地省市的經貿交流功能，澳門中葡平台面臨被“繞開”的壓力。

三、新發展格局下推動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對策建議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發揮香港、澳門優勢和特點……深化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在新時代新征程，澳門應主動作為、積極有為，加快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質量升級，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為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提供有力支撐。

（一）貫徹新發展理念，準確把握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新內涵

在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準確把握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的新內涵，對於發揮澳門的優勢，激活功能平台的活力，調動各方參與的積極性，做強做實平台功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從升級目標來看，澳門中葡平台建設目標必須服務和服從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構建新發展格局，強調通過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因此，澳門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匯點，促進澳門中葡平台升級發展必須服務和服從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通過澳門中葡平台搭建內地與東盟、非洲、歐盟、拉美等雙向連接的市場網絡，服務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實施 RCEP 和擴大對

發達經濟體的開放,助力國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其次,從升級模式來看,澳門中葡平台要加快由服務商品和要素流動型合作向服務基於制度型開放的國際規則對接合作的功能轉變。一方面,全球經貿規則發展正轉向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數字貿易、競爭政策等領域;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正處於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關鍵階段。這意味著澳門中葡平台的功能要適應全球開放合作的新階段,特別是在主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總體布局的需要上,進一步發揮澳門“精準聯繫人”的作用,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加強經貿規則對接與管理標準互認,為中國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探索道路、積累經驗。

第三,從升級載體來看,澳門中葡平台要通過澳門“特色優勢”發揮更大作用。當今世界,以城市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正在逐漸成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新生力量,友好城市成為連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橋樑和紐帶。因此,澳門要發揮“全球城市”的功能角色,充分利用中央授予澳門開展對外事務的“自主性”,深化與相關經濟體和全球城市的經貿關係與文化交流,推動國際友城建設,服務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另外,發揮澳門社團等組織作用,加強與葡語國家的政黨、社會團體之間的交往,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組織性互動關係的構建。發揮澳門華僑華人資源優勢,加強與葡語國家華僑華人聯繫,特別是年輕一代華僑華人的交流,助力構建中國—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

(二) 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完善和夯實澳門中葡平台功能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指出“支持澳門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功能,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門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產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由此表明,中央政府積極支持澳門特區“背靠祖國”、“善用(祖國)內地因素”來鞏固和發揮澳門優勢、特色和競爭力的經濟發展理念^⑨。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也應該背靠祖國,善用祖國因素,把握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等重大戰略機遇,賦予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新內涵,加大力度完善和充實“中葡平台”功能,加快融入國家“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並實現澳門自身更好地發展。

首先,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為契機,發揮澳門“一帶一路”建設節點城市功能,推動和服務葡語國家全面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提升澳門中葡平台的新動能。按照中央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的要求,在對接“五通”任務的基礎上,穩步拓展合作新領域。鼓勵內地企業與澳門企業通過聯合投融資、技術合作等方式,共同參與葡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助力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一批“小而美”民生項目,增進人民福祉。

其次,強化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效應,支持澳門建設綜合性服務平台,不斷提升澳門中葡平台的能級。大灣區建設促進了區域互聯互通,深化了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有利於澳門發揮自身獨特優勢。要通過深化區域協同彌補澳門城市功能的短板,積極主辦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博覽會(澳門),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經貿投資、服務貿易、資金融通、數字經濟和人文交流等各個領域實現全面高質量合作。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建設為載體,進一步擴大中葡金融合作(融資擔保、信託基金、融資租賃)、現代物流產業合作(建設跨境電商高效物流通道)、旅遊合作(探尋VR/AR技術在旅遊營銷的作用)、文創影視產業合作(建設中葡文化產業園)等,不斷完善澳門中葡平台的服務功能。

第三,落實《橫琴方案》,按照“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則,高標準高水平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借鑒新加坡、迪拜等自由港的產業發展經驗,建設橫琴中拉產業園、中國葡語國家中醫藥產

業園、中葡金融服務平台和數字貿易樞紐港、中葡國際貿易中心等專業化園區，提升對全球高端要素和創新產業的承載能力，打造現代化產業集群，提升澳門中葡平台的質量，並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發揮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作用，以綠色低碳、服務貿易、數字經濟等為突破口，培育中葡貿易新業態，增強中葡經貿合作內生動力，打造適應新時代的澳門中葡平台。

(三) 完善現代商務服務體系，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專業化服務水平

中國與葡語國家在資源稟賦、貿易結構的互補性強，葡語國家對中國消費品、商品服務需求龐大且與日俱增。目前在農產品、能源、基礎設施、旅遊、醫療衛生、文化交流等領域，中國與葡語國家已經形成緊密的合作關係。隨著國家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去”，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務合作橋樑紐帶的澳門，應大力完善現代商業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專業化服務水平。

一方面，要強化商務促進服務體系。適應全球貿易投資合作變化新形勢，抓住內地擴大對外開放的機遇，澳門自由港應對標香港、新加坡等全球運營服務中心，加強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更具國際化和競爭力的商務促進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專業化服務水平。以中葡論壇及其輔助機構、專業小組為載體，重點推進海關、專業服務、中小企業、跨境電商、貿易便利化等領域的開放合作，逐步推進貨物貿易、商品貿易、投資保障等承諾落地，尤其是市場准入、出入境安排、投資法律體系細則等。抓住全球價值鏈重塑的機遇，推動澳門的專業服務優勢與葡語國家的資源稟賦、市場規模、成本優勢等相結合，強化各自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促進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分工合作高端化。鼓勵澳門本土專業服務業更多參與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揮澳門區域投資平台、貿易物流樞紐、高端服務平台等優勢，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在產能合作、產品生產、市場開拓以及跨境資金流動等提供專業服務，推動澳門中葡平台功能不斷升級。

另一方面，要完善風險防控服務體系。統籌發展與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方略，也是“一國兩制”原則下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應承擔的義務。新時期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內涵理應包括構建完整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環境風險等防控服務體系。因此，澳門應積極探索建立中國與葡語國家商事仲裁中心，發揮澳門與葡語國家歷史文化聯繫緊密、擁有相近的行政和法律體系、以中文與葡文為官方語言等優勢，圍繞市場違約、稅收徵管、會計準則、商業歧視、商業索賠等領域的風險問題，培育和完善的風險防控服務體系，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提供融資租賃、股權設置、債權組合、專業人才、法律會計、商業管理、爭端仲裁、追求索賠等專業服務。借鑒香港的經驗，澳門可完善投資保險、進出口信用擔保等制度體系，健全赴葡語國家投資的風險擔保機制。建立和完善中葡人力資源屬地化培訓體系，實現跨文化融合，減少跨文化衝突。另外，澳門中葡平台應創新合作模式和實施路徑，積極吸收葡語國家共同體各成員國、觀察員等不同參與主體，通過中葡論壇與葡語國家共同體建立有效銜接機制，確保中葡論壇各項成果能得到有效執行。澳門中葡平台風險防控服務體系的完善，將助力中葡雙方積極謹慎應對風險和挑戰，平衡收益與風險的關係，確保合作互利共贏。

(四) 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升澳門中葡平台國際影響力

第三方市場合作是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由中國首創的國際經貿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場合作”這一概念首次正式出現於2015年6月中國政府同法國政府正式發表的《中法關於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②。第三方市場合作作為國際合作新模式，將中國的優勢產能、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有效對接，實現1+1+1>3的效果。習近平主席

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指出,“鼓勵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通過多方參與實現共同受益的目標”^①。服務新時代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澳門中葡平台應重視機制化建設,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利於提升“中葡平台”的國際影響力。

首先,充分認識“第三方市場合作”對澳門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重要性。澳門中葡平台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產業分工合作新模式,回應了“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遵循了國際經濟合作中的市場原則和國際通行規則,是澳門中葡平台探索機制化建設的新嘗試。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既可以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領域的深化,也能拓展澳門自身發展空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尤其是可以發揮澳門中西方文化交流交匯中心的優勢,以讓西方人更容易聽懂的语言或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將中國的文化、中國治國理政經驗傳播出去,助力中國與葡語國家民心相通,促進一批葡語國家成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建設者。

其次,準確把握澳門中葡平台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科學內涵。在構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的目標願景下,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將成為“中葡平台”質量升級的重要內容,以及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有效方式。對澳門而言,可以將澳門的傳統服務優勢、資金優勢、制度優勢與葡語國家的需求有效對接,發揮各自所長,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升合作成效;對葡語國家而言,通過第三方市場合作,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得到提升,進而促進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對內地而言,有利於推動產業邁向高端化發展,塑造良好的企業和國家形象,促進中國企業更好的“走出去”,擴大與葡語國家各領域全方位合作。

第三,積極探索澳門中葡平台“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新路徑。全方位發揮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從本地建構“第三方市場合作”夥伴,向多方優勢資源整合轉變,促進澳門中葡平台的質量升級。具體而言,一是針對內地不同省市的需求,吸引內地央企和民營大企業到澳門開設辦事處,或者與澳門企業合作,共同開發葡語國家市場;二是通過澳門中葡平台,發揮澳門獨特優勢,參與內地與葡萄牙、巴西等國家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項目,既可規避不必要的競爭,還能夠改善全球治理中不平衡提供新模式;三是澳門可以積極拓展與歐盟國家在非洲葡語國家市場的第三方合作,在基礎設施、電力、能源、金融等重點領域推進務實合作。

①《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就中葡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有關情況接受媒體聯合採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台港澳司網, 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zt_zp5/lanmufour/201610/20161001409849.shtml,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9日。

②參見李炳康:《澳門平台發展戰略: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71~89頁。

③《推進新的合作,譜寫新的篇章》,載於《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第一屆部長級會議講話匯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網站, <https://www.forumchinapl.org.mo/sc/home->

sc/, 檢索日期:2022年10月23日。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北京,《人民日報》,2016年3月18日。

⑤齊鵬飛:《以“適度多元化”和“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建設為導向——澳門回歸20年“一國兩制”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北京:《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11期。

⑥⑦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2020年,第44頁、第73頁;第73頁。

⑧《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在澳門行穩致遠——訪澳門特區候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北京:《人民日報》,

2019年12月8日。

⑨吳志良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8—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48~249頁。

⑩李安勇、張風超：《新格局下澳門“一個平台”建設的新思路》，北京：《港澳研究》，2018年3期。

⑪文中數據如無特別說明，均來自澳門經濟統計暨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zh-CN/>、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秘書處官網 <https://www.forumchinapl.org.mo/sc/>整理而得。

⑫齊鵬飛、張玲蔚：《澳門特區“遠交近融”發展戰略的成功範例——中葡論壇建設述論》，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6期。

⑬Os nove países de expressão oficial portuguesa seriam a décima maior economia do mundo, valendo 1,8 bilhões de dólares, ficando abaixo do Canadá e acima da Coreia do Sul, numa lista liderada pelos Estados Unidos. <https://www.plataformamedia.com/2021/07/12/paises-lusofonos-juntos-seriam-a-10-a-maior-economia-mundial-2/>，檢索日期：2022年6月25日。

⑭《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賀一誠》，北京：《人民日報》，2021年12月23日。

⑮中國貿促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指南——東南亞篇》，北京：《中國貿易報》，2016年5月7日。

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成立十五週年第三方評估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評估組，2020年5月。

⑰趙玉敏、張劍：《抓住深化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的新機遇》，北京：《國際貿易》，2016年10期。

⑱劉逸、紀捷韓：《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韌性的特徵與空間差異研究》，北京：《地理研究》，2019年9期。

⑲齊鵬飛、王玉：《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展——澳門回歸20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祖國內地因素”探析》，北京：《港澳研究》，2018年4期。

⑳李克強：《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北京：《人民日報》，2019年3月5日。

㉑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北京：《人民日報》，2019年4月26日。

作者簡介：毛艷華，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陳朋親，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後。廣州 510275

[責任編輯 劉澤生]